

← (上接10版)

评价也常常会落到“晚清时期的介绍外国文学的先进者”“民国时期的反对文学革命的遗老”这样的印象上,而这个印象从五四时期的《新青年》杂志一直延续到了今天。在这之中,有两个重要人物的评价不可忽略——郑振铎说:“他的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已完全动摇了”(《林琴南先生》);鲁迅骂其为“法西斯(Fascist)”(《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》)。

对于这么长的一个时期以来的“冤案”,樽本不慌不忙地“剥茧抽丝”。他首先从五四时期的林纾批判谈起,在《漫骂林纾的快乐》一章中澄清了这样的事实:林纾最初无视《新青年》集团,即文学革命派对他的攻击。可是,他不能割舍对教育的期待与热爱。他通过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写信的方式,述说了必须拥护古文、固守旧思想的信念。此外,还发表了短篇小说。而这就被陈独秀等人的《新青年》所抓住,文学革命派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,就必须树立一个强劲敌人。通过钱玄同、刘半农在《新青年》上演双簧;陈独秀等人对林纾的批评,制作出一个以武力对文学革命派进行恫吓的旧文人代表的林纾形象。正是因为刘半农批判了林译莎士比亚小说,所以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林纾是一个胡乱翻译的人的印象。这是起始。由此,所谓林纾

将莎士比亚戏剧改成了小说、林译易卜生、斯宾塞、塞万提斯等等“冤案”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。针对这些“冤案”,樽本花费了巨大精力,细细追查底本,将其一一澄清。

众学者的观点大同小异,日本人也不例外。比如,池田孝写到:“有时将著名的戏剧翻译成小说体,添加了许多叙事,删除了对话,而变得面目全非。例如,莎士比亚的《亨利第四》《雷差得纪》《亨利第六》《凯撒遗事》及易卜生的《梅孽》(群鬼)等翻译成小说之类的作品,这是很大的遗憾。其错误之源之一在于口译者,这不得不让人痛感不懂外语是不能翻译出好的作品的。”(《林琴南先生与曼殊大师——中国文人的先觉者》)同样也是一篇日本人较早时期写作的专论,今泉润太郎说:“如果对文学史多少有些知识的话,就不会出现这种不合逻辑的想法吧。这种情况在《亨利第四》《雷差得纪》的场合中,演变成将戏剧完全翻译成另外一种小说的特技。”(《林琴南——通过翻译活动与评论活动》)宋云彬著,小田岳夫、吉田岩村共译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虽然现在无法追查宋氏的原作,但因为该书被翻译到了日本,所以在日本的学术界也传播了这样的观点:“我国的旧文学者们,向来不辨小说与戏剧的区别,所以这是时势的原因,我们未必能够责备

林纾。”实藤惠秀是著名的中国文学、中日关系史研究者,他撰写的《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》(日华学会1939年)成为研究者的重要资料。不过,他在与实藤远共著的《中国新文学发展略史》中也表述了相同的观点。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增田涉说:“可是,像这种事情,与其说是口译者的罪过,不如说是与林纾自身作为一个翻译家的态度有关的问题吧。”(《中国文学史研究》)

不胜枚举。这样的一种中日学界的“共识”,虽然没有写明来自何处,也就是研究者虽然没有举出郑振铎的名字,但可以看出是直接沿用了郑氏的观点的。

那么,我们不禁要问:研究者在提出一个观点时,是否都亲自调查了资料呢?也许,对“权威”的看重影响了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方法。那么多的著名学者异口同声,他们的说法对后来者产生了很大影响。日本学者首先受到的自然是来自中国研究者的影响,而后,作为著名学者的他们的观点又对后来人产生了影响。那么,我们何以能够相信今天日本学者提出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呢?——那就是实证,是新资料的提出。

樽本很奇怪:“以往的文章都批评林纾将戏剧改成了小说。那么,是怎样改成了小说呢?按理,研究者应该讨论这一过程吧。可是,奇妙的是,没有一个人进行过具体的说明。这

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是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、不需要进行查证的事情么?”为了回答这个问题,他采用了最老实、最基础的文本对照的方法。结果一目了然,二者的内容相差很远。如果每一个研究者都认真地将英文与林译进行对照的话,那么也就不会出现所谓林纾将原来的戏剧改成了小说的结论。

那么,究竟林纾翻译所用的底本是什么呢?比如林译莎士比亚历史剧,为了得到这条书目信息,樽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。简而言之,他亲手追查、亲眼验证了11种书籍,才得出了真正的答案。而这些版本,(1)Charles Alias (editor) & Herbert Sidney (illustrator): *Scenes from Shakespeare for the Young*, Ent. Sta. Hall, London, 1885. (2)M. Surtees Townesend: *Stories from Shakespeare*, Frederick Warne & Co. and New York, 1899 (3) Mary Macleod: *The Shakespeare Story-Book*, 1902等等,全都是20世纪初出版的国外书籍。怎样获取资料?值不值得花这样的精力去查找?因为很可能会一无所获,诸如此类的疑问,显然没有给他造成困扰。结果显示,原书为奎勒·库奇的小说化书籍《莎士比亚历史物语》(Quiller-Couch: *Historical Tales From Shakespeare*, 1899)。这就就辨明了郑振铎对林译的批判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冤枉。这个定论,就是林译莎士比亚冤案。前述中日学界众多的讨论都承袭了定论,通过不断的重复而强化了对林纾的批判。

在有关林译小说的批评上,除了前述观点外,还有一个方式也是“被继承”了的——那就是郑振铎的论文《林琴南先生》(《小说月报》1924.11.10),这是他在林纾去世后公开发表的评论。可以认为,这篇文章正是后来林译小说评价的原型。“他不懂得任何的外国语,他的译书,乃由一个懂得原文的译者,口译给他听,他便依据了口译者的话写成了中文。他写得非常的快,他自己说,他每天工作四小时,每小时可译千五百言,往往口译者尚未说完,他的译文已写完毕。他的译文谬误,常所不免。”在郑振铎这段话的影响下,后来的研究中大致体现出两种评价方式。首先都是以确认林译小说有缺点为前提,然后再对其进行评价的,所以结果就分成了正反两种。一是林译有缺陷,所以林译小说不好;二是虽然林译有缺陷,但它对当时中国的文学界、对很多文学人士产生了重大影响,所以依旧具有很高的价值。

对此,樽本认为,在最早提出这种评价模式的意义上来说,郑振铎的文章是一篇划时代的论文。

如同林译莎士比亚的问题一样,对于林纾翻译的易卜生、斯宾塞、塞万提斯小说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。要之,在针对林译小说进行批评时,并没有获得正确的证据,所以批判是不能成立的。不仅如此,持续的时期之长,参与的研究者之多,就不得不令我们重新审视这个问题。对于晚清时期的小说进行研究,不仅会遇到文献调查的困难,而且,像林纾这样的翻译小说还涉及到跨语言跨文化的问题。文学评论的方式有很多种,相对于欧美理论解析式,日本学术界更重视资料与证据的提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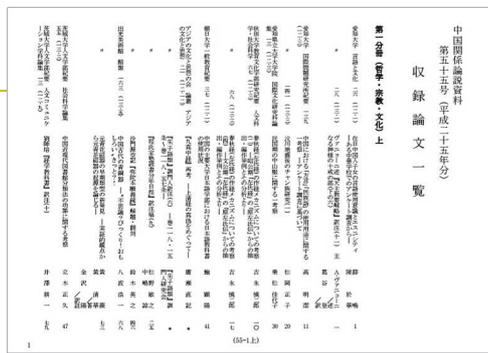
如此一来,以往中国对林译小说的批判在日本学者的眼中就成为了“冤案”。不过,有趣的是,樽本自问自答——“我与林纾又是什么关系?是否试图为‘法西斯’林纾平反?”——这句话令人哑然失笑。非出于“中国式人情”,而只是依据事实,对林纾及林译小说进行调查而已。樽本认为,中国的学术界百年来延续了“共同认识”,实则指出了国内学术不严谨、人云亦云的弊端。

\* \* \*

晚清小说是中国的小小说,但对其研究却是世界的。日本学术界在这一领域内所取得的成就,为学术研究整体做出了重要贡献,已经超出了是不是“中国人的研究成果”的讨论范围。如日本出色的鲁迅研究一般,日本的学术界是扎扎实实地每一个点,当每个人所做的那个点拼起来时,就成为一个稳固的丰厚的鲁迅研究了。在晚清小说研究领域而言,中国也可以借鉴这样的研究方式,事实上,现在的学术开展也比较倾向于这个方向。

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。虽然对于日本学者而言,在日本研究中国的文学可能在资料掌握上不足;同理,中国的学者也缺乏对外部资料的掌握。比如在研究晚清的翻译小说时,倘若想追查日本的版本,想追查晚清文人在日本的活动情况,身处中国的学者也很难获得有力的资料。这就需要双方共同协作。学术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。丰富、充实之,是每一个研究者的使命。

(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)



《中国关系论说资料》,论说资料保存会,2013。这份刊物创办于1964年,按年度、研究领域对在日本发表的研究论文进行收录,由哲学、宗教、文学、语言学、历史、政治、经济等分册组成。



林纾、魏易译:《吟边燕语》,商务印书馆,1904



增田涉文库,关西大学,藏书约15000册,以西学东渐及鲁迅研究相关的资料为主。增田先生曾对为创办《清末小说》来访、约稿的樽本说:“我来写,来支援你们。”

均资料图片